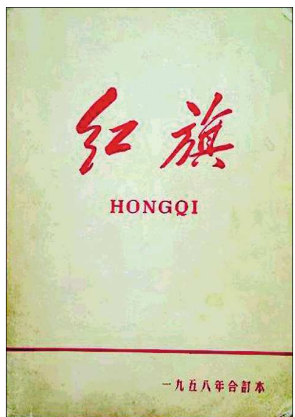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特别报道之四



大事记

1922年-1928年

1922年9月13日,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报《向导》周报,经中共“二大”决定,在上海创刊。

1925年九、十月间,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,决定加强对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。

1927年4月12日,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。

1927年7月18日,《向导》周报全文刊载了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时局宣言》,揭露了“国民政府在反动阴谋之下的政局”,并停刊。

1928年11月20日,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份机关报《红旗》在上海创刊。

参考资料

- 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(第一卷)
- 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》
- 张国焘:《我的回忆》
- 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》
- 《联共(布)、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》
- 《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》
- 《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》
- 《中国国民党第一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》等

红色传奇,下期开讲:  
苏区“大肃反”  
真实记录

秘密发展的中共在“三大”时,全国仅有420名党员;“四大”召开时,全国有994名党员。而中共中央创办的机关报——《向导》周报却在全国发行3万份以上,还有一种说法是,最多时到了10万份。

于是,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,这个弱小的组织不仅没有被同化、融化,反而在两年多时间里,骤增57547名党员。虽然没有握住枪杆子,但中共对思想意识形态的宣传、控制,在很大程度上把强势的话语权牢牢握在手里。

“党报党刊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历史任务,当然,成长过程中也存在官僚主义、八股文,并不是每一步都成功的。但无论如何,党报、党刊最终需要贴近民众,最大限度表达民众的诉求。”山东大学传播学研究所所长冯炜表示。

# 没有枪杆子 但攥住了话把子

本报记者 任鹏

## 党员不足千人 党刊发行三万

冬日里的一天,寒风凛冽。北京一家书店的店主突遭横祸:店里闯进几个凶神恶煞的巡捕,吵吵嚷嚷地把书店查获,理由是售卖违禁书籍。

来者是当时军阀的人,“违禁书籍”指的是《向导》周报。这是1923年2月,《向导》创刊才几个月。

共产党创建初期极为重视宣传。当时中共中央局有两部分工作,一项是组织,另一项就是宣传,分别由中央局成员李达和张国焘负责。

在此之前,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曾秘密主办了《共产党》月刊,首次公开“共产党”的旗帜。但仅出6期后便于1921年停刊。

1922年6月间,法租界捕房封闭了中共发行书刊的机构——新青年书店。中共“二大”决定创办《向导》周报。9月,《向导》在上海秘密创刊。这是共产党第一份中央政治机关报。

初生的《向导》最初由陈独秀、蔡和森担任主编,蔡和森在“二大”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。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也在上面发表过文章。

由此可见,中共对《向导》的重视程度。

对那位店主来说,虽然店里的《向导》被查封,他却没蒙受太大的经济损失。

“租界当局每次查获时,即处罚印刷所或书店以高额罚金。这种经济上的损失,均须由中共中央承担。”张国焘在《我的回忆》里说,公共租界严禁《向导》印刷发行,中共为这件事遭受了不少折磨和经济上的重大损失。

“现代民主政治,若不建设在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上,是没有不崩坏的。”《向导》发刊词把矛头直指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目标。

可以想象到的是,《向导》自然受到当局的百般阻挠和破坏。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后,印刷和发行更充满危险。印刷厂被迫设在偏僻的小巷,编辑部经常搬迁,躲避查扣和没收。

犹如一个初长成的邻家女,《向导》的发行数量和它对读者的影响力,远远超过当时全国的共产党员数。

1925年11月,共产国际收到驻中国代表的一份报告中显示,当时《向导》的印数超过3万份,这在全国刊物销量中位居前列。还有一种说法是发行量最高到了10万份。而十个月前,中共“四大”召开时,全国仅有994名党员。

中共为何从诞生起便如此重视宣传?

“中共早期党员多有留学经历,有广阔的国际视野,从自身体会来说更重视宣传的作用。”山东大学传播学研究所所长冯炜认为。

“中共中央认为其有政治指导作用的,其《向导》编辑方针直接由中央决定,不受宣传部的管辖。”张国焘的话,颇能说明《向导》的作用,把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等意识形态放在首要地位。

## “看不懂, 这是一个什么向导?”

但一封读者来信,打破了《向导》编辑部的平静。

在1926年8月6日第166期“读者之声”专栏中,《向导》刊登了读者“冬原”的一篇文章——《豆腐涨价与向导周报》。

“我们苦人不但看不懂,买也买不起了……但我老实告诉你们……他们买一块豆腐要吃惊,更说不到买《向导》了。”“冬原”笔下毫不留情,“你们的文字太深了……他们确实看不懂……需要革命而不知革命为何物者,却偏偏不能给他看懂。这是一个什么的向导?”

致力于思想意识形态传播的《向导》,和被启蒙对象之间,似乎没有对应好。

“冬原”的指责并非毫无道理。《向导》当时的定价是每份6分,但10文一块的豆腐对很多人来说是奢侈的,更别说花一家人几顿饭的钱去买《向导》。

在给“冬原”的答复中,编辑部承认《向导》的贴近性和通俗化存在不足,但“《向导》既然担起指导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责任,自不能兼顾通俗化”。

这是一种不可言喻的无奈。事实上,《向导》无论是文风还是价格,面对的并不是普通工农群众,而是有文化水平、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特殊读者群,更直接地说,他们旨在拉拢中小知识青年。

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曾在笔记中称:《向导》的主要对象是学生和青年。青年团广州地委在1925年4月的报告中也提到:《向导》在广州只有知识者看。

“即使用极通俗的言辞,无代价地向农民去说,他们也不愿意来听……然而中国革命中万分需要《向导》一类的刊物,这应

该也是公认的事实,顾此则失彼。”编辑部也明白,很多革命理论不可能被最底层的工人和农民所广泛接受。

“那时党刊主要读者群就是知识青年,但中共可以利用这些知识青年进行二次传播、分级传播。这样,共产党的纲领、政策就可以深入浅出了。”冯炜认为。

因此,选择知识青年和学生作为直接受众的宣传策略,显然更容易将思想意识形态传播出去。

## “宣传不如共产党, 很可虑”

《向导》大红大紫,却不是中共唯一的舆论工具。

事实上,针对不同的民众阶层,中共创办相应的杂志进行宣传。

一份1926年9月通过的“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”展示了中共刊物的丰富多样性。

决议案要求《向导》增加鼓动的性质,更要求“姊妹报”——中共中央理论机关报《新青年》适应革命思想斗争的急需。

中共还计划增加通俗的机关报《劳农》,主张给工农群众读者政治上的指导,使工农群众能明了革命斗争的状况及意义。

此外,中共还有一份秘密刊物《党报》,并且“须改良整顿,使能集合中央各部及各地之党内生活和工作经验,以为训练同志之材料及指导”。

理论刊物的创办也很有层次。比如,共青团创办《中国青年》,全国总工会机关报《中国工人》,妇女联合的机关报则是《中国妇女》。

为使各种出版物都能得到周到的指导,中共要求设立一编辑委员会,报告中央及各地机关报的状况,加以审查。

虽然国共合作正在进行,但在宣传上,中共仍保持共产主义、马克思主义特色的独立性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曾坚持,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必须坚守组织独立,批评权独立的原则。

而中共在意识形态宣传上的强大优势也体现了出来。

思想意识形态的传播、控制也需要一种捷径。简短而强有力的口号是一个不错的方法。

“打倒帝国主义”、“打倒军阀”是《向导》首先提出来的,但帝国主义、军阀都是舶来词,甚至诸如“实际”、“封建”、“左右派”、“列宁马克思”这些如今毫无特点的词语,当时很多年轻人也觉得新奇时髦。

在中共的极力宣传下,很多新青年以阅读《向导》为时尚、时髦。“打倒军阀”、“打倒帝国主义”等口号慢慢深入人心。

中共的思想意识形态宣传,也透过这些刊物,在两党合作中悄然向国民党

渗透、影响。

“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。”在1923年底,中共指出国共合作中采取的组织 and 思想两种方式。组织上是“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……同志们为之创设”。政治上则是促使国民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。

《向导》等刊物的影响力从一位国民党青年的感慨中能看得出来:“我们这几年所看的刊物是些什么?谁都不能否认是《向导》……然而这些刊物只是为共产主义而宣传。”国民党内部也有人慨叹:“本党宣传工夫不如共产党,很可虑的。”

“国共两党相比,中共打了舆论胜仗。早期的共产党人是堂堂正正的,能体察民众疾苦,在让西方思想适应东方历史上,深谙其道,口号喊得响,主义亮得明。”冯炜说,“比如,最让工农感到实际的,在农村是打倒土豪劣绅,分土地;在城市是打倒军阀和压迫者。鲜明的口号,主张顺应了社会民众需求和潮流,这也是最大的贴近性。”

冯炜介绍,国民党当时是合法政府,掌管国家机器和宣传机器,也有宣传部门、报纸报刊,但是宣传思路不明确,主张不合理,方针政策不明确,对民众的号召力不足。

## “党报党刊 最终需要贴近民众”

《向导》在大革命失败后结束使命,1928年年底,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二份机关报《红旗》在上海创刊,继续挥舞宣传的大旗。

“我们所处的时期是极反动的时期,身受的一切痛苦丝毫未得解放……国民党政府本就是残酷剥削民众脂膏,压迫民众一切自由,以假改良手段欺工人阶级的政府……”创刊号上,全文刊载了《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书》。

1930年8月2日,《红旗》停刊,共出版了126期。

此后,《红旗日报》、《红旗周报》、《红色中华》、《红星》、《新中华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先后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报。直到1948年6月15日创刊《人民日报》。

在严酷的环境下,《红旗周报》不能公开出版发行。为了掩护其真实面目,常以“实业周报”、“佛学研究”等假封面出现。

“党报党刊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历史任务,当然,成长过程中也存在官僚主义、八股文,并不是每一步都成功的。但无论如何,党报、党刊最终需要贴近民众,最大限度表达民众的诉求。”冯炜表示。

中共对意识形态控制的手法,让蒋介石也感受到宣传机器和传播能量的威力。

“共产党分化我党政策,无所不用其极,造作‘左派’、‘右派’、‘西山会议派’、‘新右派’等等名词,任意加于本党同志之上。受之者如被符咒,立即瘫痪而退。”



▲《向导》周报